

結論：一個「女性經驗」的家庭計劃

1922年山額夫人帶來了節育的思想，但是因為1920年代的中國與1959年的臺灣各有其特殊的背景，而在思想的傳入過程中，既有接受，亦有抗拒。1950年代的臺灣，主持農業工作的農復會領導者，在評估臺灣的生育狀況，決定實施節育，但在政治禁忌的年代中，節育違反國父遺教，更違反基本國策，也觸犯到了天主教的教義，無論是在議場上，或者在輿論上，反對者與贊成者的爭論始終不休。農復會一方面希望藉由蔣夢麟的發言，讓更多人知道節育，但一方面，又不希望山額夫人的到訪使得原本正反雙方的衝突更加劇烈，於是山額夫人無法來臺灣，農復會以計劃制補助民間團體的型式默默的去。中國家庭計劃協會便是在這樣的考量與認知之下成立，並成為第一個在臺灣倡導家庭計劃的組織。

中國家庭計劃協會，以一個民間團體的性質，能夠運用學校、村里、衛生院所、公營事業原有的集會，與他們合作，並且能夠不被政治力所干擾，關鍵便在於家庭計劃協會的主事者舒子寬女士，擁有豐厚的黨政、社會與各種領域的人脈，並且與農復會的領導者蔣夢麟、蔣彥士、錢天鶴等人保持友好的關係。因此經費方面能夠源源不絕。然而她們爭取經費的過程也並非一帆風順，而是藉由人脈關係逐一打通各項障礙，方能有推動家庭計劃運動的力量。

家庭計劃以孕前衛生走入婦幼衛生，在公開的說法裡，是為了避免政治壓力，因此，人口的問題改以衛生問題的面貌呈現，是為了避免政治上反對的聲音干擾。這是一種政治上的語言。然而，在檔案之中我們讀到了，孕前衛生進入婦幼衛生的意義在於，生育狀態的改變，而且是集體的，藉由機械的阻絕，以各種方式使得婦女改變生育習慣。家庭計劃協會試著一邊教導群眾，一邊讓民眾有自主思考，自由選擇的能力。然而，隨著美方資金的投入，以及新式避孕器樂普的問世，臺灣的家庭計劃發展有著革命性的突破，但在此時，家庭計劃協會也與農復會中止了計劃制的合作，轉而與其他機構合作，繼續推行他們的小規模的家庭計劃，以及其他包括幼兒安養，婚姻指導等等社會福利的活動。

從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投入家庭計劃發展的這十年來看，家庭計劃協會所從事的，無疑的是一個充滿女性經驗，與具有女性觀點的家庭計劃。從發起的動機，可以看出身為一個女性，舒子寬學習到了節育的知識，使她與其他女性比起來，

要擁有更多的自由。而在世界潮流的影響之下，使她有想要組織一推廣節育團體的想法。在她活潑而充滿熱誠，開朗而又能在各種社交場合活躍的個人特質中，她能把握個人特質的優點，爭取到她盡可能所可以爭取到的資源。因此，蔣夢麟可以成為她的忘年之交，遠在國外的布拉許夫人可以和她一見如故，想要收她做乾女兒，她在美國募款，可以折服洛克斐勒。這些都是相當美好的故事。

而在黨政人事關係上，她能夠掌握到相當多的人脈，並且不但爭取到了男性的支持，還在官夫人的社交圈中，獲得不少的友誼。這些對於她推動節育來說，都是無形的助益。

在與民眾溝通的時候，筆者注意到了，身為一個女性，她能夠與婦女感同身受的對話，能夠讓婦女說出她們想要說的話，並且注意到了婦女在身體上的感受。她主張先做小範圍，多訪談，這些都是以婦女的處境做為優先考量的一種表現。

當然，做為一個開路先鋒，家庭計畫協會的工作經驗及其所建立的方法、制度，對於後繼者而言具有很大的幫助，例如以卡片建立受訪與接受指導婦女的資料；「回復訪視」制度，用以了解個案的使用情形及問題，並可做節育材料的補充；以及生育指導站的分類等等，都是她們的創舉。而她們使用各種可以運用的媒介，來宣傳節育，她們有報紙專欄，有廣播時段，有小傳單，有專書，有話劇，有海報 等等不一而足，這種精神也為後來的執行者，如婦幼衛生協會、家庭計畫研究所所承繼。臺灣的家庭計畫宣傳方式，不僅多，而且廣，幾乎無處不在，可以說是中國家庭計畫協會奠定下來的基礎。

本文所能提供給學術界做一參考的地方約略有幾點：第一，本文試著擺脫一固定的假設，即假設 1950 年代的婦女必然受到壓迫，擺脫以今非古的觀點，而試著以背景鋪陳的方式，將「中國家庭計畫協會」帶出來、呈現出來，讓她們的女性特質「發聲」；第二，本文嘗試以檔案的閱讀，與口述訪談方式的並用，藉以呈現一個身為女性的執行者，當她在面臨有關女性身體與女性生育的家庭計畫運動時，她的女性特質會帶給她什麼影響，她會有什麼想法？她會如何去做？；第三，本文處理的雖為單一機構，但是並未忽略它與整個大環境的互動關係，因此農復會、黨政關係等等，都是與中國家庭計畫協會的發展息息相關的，尤其是家庭計畫協會與其背後的黨政關係，本文似乎是學界第一個觸及並試圖探討的。當然在材料與人的記憶都有一個限度之下，本文的初探無法將每一條線索都挖掘

出來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這是一個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。

本文當可再做一延伸性的討論。在中國家庭計劃協會之後的婦幼衛生協會，及其背後龐大而複雜的關係，各機構之間的合作，各機構主事者之間的合作，以及民眾的反應，都是可以再做研究的題材。還有一個可供筆者與學界日後努力的方向：舒子寬所代表的，當然只是「一個」「一種」女性經驗而已，其他的女性執行者對於家庭計劃又是如何看待呢？甚至我們可以將這問題移到民眾身上，民眾的聲音我們該如何去呈現它？本文雖然嘗試著從報刊雜誌上舒子寬與民眾的對話中看到一些端倪，然而不可否認的，這些材料若欲代表民眾的聲音，終究顯得過於薄弱，那麼，我們如果要呈現民眾的聲音，是不是就必須從事大規模的口述歷史不可？抑或我們有其他材料可以替代？

雖然中國家庭計劃協會還沒走入歷史，它目前仍然還持續的在舉辦各項活動，然而它目前主要是以老年人為訴求的「萬年青俱樂部」為主要的活動，這也可看出時代變遷的痕跡。舒子寬女士年近九十，但是當筆者問起她對於家庭計劃協會的歷史定位是如何看待的，她仍然用很溫和但又堅定的語氣告訴我：

我只是個發起者而已，真正要靠的還是各方面的力量。但我們是最早發起的，這是沒有辦法可以否認的。是我們發起，然後大家慢慢幫忙、發展，開天闢地的還是我們。¹

¹ 趙育農，舒子寬女士訪談記錄(二) (2004.1.19)。

一個女性經驗的家庭計畫：臺灣家庭計畫早期的發展(1954-1964)